
传播符号学 ● ● ● ● ●

后深度体育媒介化时代的符号现象学之思^{*}

魏 伟

摘 要：深度体育媒介化是体育媒介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必然结果，它以体育重大事件为基本表征。如今，高度数字化的后深度体育媒介化时代已然到来。本文运用符号现象学来研究后深度体育媒介化时代的各种新现象。后深度体育媒介化时代跳出了过往的线性时空观，呈现出“圆形时间”形态，形成了独特的圆形时空观。具身性和离身性问题形成缺席的在场、身体间性和远程呈现等不同的体育赛事再现形式，赛博格化的趋势造成体育赛事中人机合一、人性化抽离甚至阙如等人类世“黄昏”怪现状，媒介体育赛场技术的意识形态和立场引发了当代媒介体育赛事的深层危机。

关键词：符号现象学，后深度体育媒介化时代，圆形时空观，赛博格化，意识形态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体育全媒体传播格局构建研究”（21&ZD346）子课题“全媒体时代体育国际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体育文化符号的全球化传播研究”（21BTY016）的中期成果。

Consideration of the Post-Deep Sport Mediatisation Era through Semiotic Phenomenology

Wei Wei

Abstract: Deep sport mediatisation is to some extent an inevitable conseq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 mediatisation, which fundamentally represents sports as mega-even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came the arrival of the post-deep sport mediatisation era characterised by hyper-digitalis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various new phenomena in the post-deep sport mediatisation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 phenomenology. Spatio-temporal relations in the post-deep sport mediatisation era are not limited to the linear temporal-spatial concepts of the past, but rather demonstrate “circular time” to form a distinctively circular temporal-spatial concept. The problems of embodiment and disembodiment create different representational formations of media sports events, such as the “absent” presence, intercorporeality and tele-presence. The ubiquitous trend towards cyborgs engenders the baroque status of man-machine integration, the withdrawal of humanisation and even the “twilight” of the Anthropocene era. The ideology and stance of media sports technology have triggered a deep crisis in contemporary media sports events.

Keywords: semiotic phenomenology, post-deep sport mediatisation era, circular temporal-spatial view, cyborg, ideology

DOI: 10.13760/b.cnki.sam.202202008

体育媒介化是在起源于北欧和德国的媒介化理论逐渐成熟之后从中派生出的一个新概念。这一理论很可能成为 21 世纪 20 年代国际体育传播发展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魏伟，马博文，张帅，2022）。如今，后深度体育媒介化时代宣告来临（魏伟，尚希萌，2021），全球体育呈现出了去全球化、去商品化和半媒介化等表征（Wei & Siying, 2022），体育与政治之间相互裹挟的关系让体育媒介化的进程更趋复杂化。因此，通过符号现象学来思考后

深度体育媒介化时代，可以厘清体育媒介化的很多新现象和新问题。

一、后深度体育媒介化时代媒介体育的圆形时间观

电视与体育的结合，被誉为“天作之合”（魏伟，2015）。这可以在符号政治经济学（魏伟，2020）、文化权力（魏伟，2019）和“屏幕微观地理学”（Barnfield，2013）等视角下得到验证。两者之间的结合诞生的媒介体育成为后现代社会的奇观。媒介体育时代之后，以体育重大事件为表征的深度体育媒介化时代让电视与体育的关系更加水乳交融。但近两年二者的这种深度融合出现裂痕，如果说体育媒介化次级发展形态中媒介体育对于赛场赛事的再现是“对文艺复兴空间和牛顿力学的摒弃”（Morse，1983），那么后深度体育媒介化时代中媒介体育的时空再现则符合海德格尔对“此在时间”的批判和尼采的非线性时间观。

（一）海德格尔的时间概念和尼采的非线性时间观

海德格尔的时间概念，从1924年马堡大学的讲课稿《时间概念》中的“当前时间”（gegenwartszeit），到终结篇《存在与时间》中的“此在时间”，有一些区别。他在《时间概念》中提到的“当前时间”，是单向的和不可逆的（Heidegger，2004，p. 121）。可测量的线性时间具有均质性和不可逆性两个特征，均质化是把时间等同于空间，是德里达批判的在场的形而上学。因此，海德格尔认为时间并不是均质化的，也不是线性发展的，同时也是不可测量的。在《存在与时间》中，他提出时间性有领会、现身情态、沉沦和话语四种结构环节（海德格尔，2018a，pp. 413 - 430）。这四种结构环节也并非均质和同等重要的。总结起来，海德格尔的时间概念是从“空间上 - 时间上对其加以规定的自然的运动，并不是一种流逝在实践中的运动，自然的运动本身全然是脱离时间的”（海德格尔，2016，p. 448）。由此海德格尔还形成了后期的时空观：“时间与空间本身出自时 - 空（zeit-raum）——比起时间与空间本身及其计算性地被表象的联系来，时 - 空是更为原始的”（海德格尔，2014，p. 444）。也就是说，时 - 空原本是不分的，后来科学用可计量的单位将时间和空间切割开，也就形成了今天习以为常的时空观。

尼采提出了“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一切笔直者都是骗人的；所有真理都是弯曲的；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圆圈（尼采，2020，p. 248）。这一在当时惊世骇俗的理论实际上是对线性时间观的颠覆。尼采以背向而行的人不会相遇

为反例,提出了时间就是一个圆圈,相同者必定复返、必定轮回的观点。过去与将来碰撞在一起,就是所谓的“瞬间”。这种非线性时间观被二十多年后爱因斯坦“时空扭曲”的相对论证明。哲学家孙周兴在尼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所谓的“圆形时间观”,即一种空间化的时间(孙周兴,2020, pp. 198 - 212)。这种时空观适用于后现代社会中的一系列呈现与再现文本。

(二) 符号现象学视域下媒介体育的圆形时空观

后深度体育媒介化时代让传统意义上的媒介体育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时有时无、若隐若现的赛场赛事观众失去了常态下影响比赛进程的功能,他们的缺席或部分缺席被媒介体育赛事“睿智”地遮蔽起来。在往届奥运会比赛的媒介呈现中,看台上的现场观众经常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但在2020东京奥运会(2021年举办)期间,这道风景线被精心搁置了。早已标准化生产的BOB赛事转播图像加大了对凸显运动员个性的特写、大特写以及团队的中近景影像勾勒,使得现场观众这一因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022北京冬奥会虽然有部分现场观众参与,但他们并非通过购票渠道入场,很多人还身着统一的服装,因此也没有成为BOB转播图像重点捕捉的对象。

与此同时,高速发展的体育赛事转播系统让新技术在重大体育赛事中不断推陈出新。新技术的集中使用使得今天的媒介体育赛事转播呈现出了以往鲜有甚至未见的全新时空域。英国学者巴斯康姆比(Buscombe, 1975, pp. 16 - 34)曾经对转播1974年世界杯的英国BBC和ITV转播进行了包含图像、字幕、声音和色彩等元素的文化与电视符码的对比研究。到了21世纪初,美国学者玛丽奥特(Stephanie Marriott)对电视事件的多重中介化展开研究,彼时的媒介时空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提出图像、声音和字幕三元素的多重中介化,从多元化的时空元素聚集中提升了事件的多层次和多模态,这些元素使得电视的“直播性”这一瞬间“越来越像塑料一般,成为一个可以被加工、挤压、扩展、改写和重写的文本”(Marriott, 2007, pp. 74 - 75)。时至今日,巴斯康姆比时代的技术和线性影像与声音叙事早已被今天无限碎片化的顺序、倒叙、插叙、并序等无规则影像和声音替代。比赛转播即时回放的相同节奏动作、慢动作、超慢动作、极慢动作镜头可能与数十年前的资料影像、正在发生的动作影像和虚拟的未来影像同框,带来了令人难辨真伪的视听困惑。早期赛事转播的“同轴”美学(镜头只出现在赛场一侧)被360度环绕的各种视角取代,尤其是反向视角,让习惯介入赛事转播观赏的受众常有时空错乱之感。但这些技术现在已经被普遍采用,甚至成为

比赛判罚和胜负裁定的支持元素。这种后现代气息浓郁的时空观与美国学者哈维（2004，pp. 324 - 354）所提出的后现代社会中的时间空间化与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时空压缩”概念比较接近，基本服膺尼采的非线性时间观，亦即孙周兴提出的“圆形时间观”。在后深度体育媒介化时代，媒介体育文本的时空结构复杂交错，各种元素的分布鳞次栉比，需要根据具体文本展开具体分析。

二、媒介体育赛事中的具身性问题

后深度体育媒介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媒介体育赛事中的具身性问题显得越发突出。韩国棋手申真谔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的线上比赛中几乎无往而不胜，但一旦赛事转到线下，他就经常输给一些水平似乎不那么高的棋手。因此，他在线上比赛中时常去卫生间的行为遭到许多职业棋手的质疑，认为他的不断离席可能让他化身人机合一的“赛博格”，成为 AI 的傀儡。类似的现象涉及传播中的具身性问题。

意大利学者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将人工智能重塑人类现实的“图灵革命”列为人类历史上继哥白尼革命、达尔文革命和神经科学革命之后的“第四次革命”（弗洛里迪，2015，pp. 99 - 115）。“身体”是第四次革命中学术界探讨的核心问题。英国社会学家特纳提出，现代社会系统中的身体理论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学理论中的首要领域”（Turner，1992，p. 162）。英国社会学家希林认为，在高度现代性的境况下，身体越来越成为现代人的自我认同感中的核心要素（Schilling，2003）。符号现象学中的身体理论指向在传统哲学中被忽视的身体与现象学之间发生的关联。身体的在场与缺席在零度赛场赛事的语境中呈现为具身和离身。这不仅针对传统意义上到现场观看比赛的观众，还波及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萨特认为，“身体表现了我对世界的介入的个体化”（Sartre，1978，p. 310）。萨特的身体观深刻诠释了零度赛场赛事状况下媒介化的低主观能动性，这从 2020 年 10 月结束的无现场观众参与的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和北美国家冰球联盟（NHL）总决赛以及 2020 东京奥运会（2021）大幅度下滑的电视收视率可以得到部分印证。梅洛-庞蒂强调身体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优先地位，他认为视觉体验向人们呈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远处景象，使人们产生能直接出现在任何地方、又不在任何地方的错觉（Merleau-Ponty，2002，p. 369）。视觉体验带来的知觉时常会给人造成错位之感。正是这种错位之感可能降低零度或低度赛场赛事

的受众卷入度。长远来看,这种错位的持续和叠加会影响受众对体育竞技赛事的认知,进而影响其参与和消费体育的行为。

刘海龙等认为,离身性问题有着控制论中对传播与身体问题的关注、后人类主义中新传媒技术语境、基特勒的媒介考古研究、麦克卢汉的媒介延伸论、彼得斯的传播中的身体观以及唐·伊德的技术现象学身体观等六种理论来源(刘海龙,束开荣,2019)。他认为,具身性问题的关键恰恰是因为“我们正体验这身体在传播中重要性下降所带来的空虚感”(刘海龙,2018)。爱尔兰哲学家莫兰(Dermot Moran)受到克里斯蒂娃“主体间性”概念的影响,在具身性研究中提出了一种“身体间性”(intercorporeality)概念,它是“身体与其他身体在总体的交互主体性与彼此共在的语境中互动的方式”(莫兰,2019)。这个概念可以解决运动员的器官移植和借助医学手段重塑身体的问题。运动员通过穿着鲨鱼皮制作的泳衣或者移植其他人的器官,甚至抽出自己的血经过处理后再输入等一系列技术手段,可以提升自己身体的潜能,获得更理想的运动成绩。孙玮(2018)将主体分为理性意识主体和身体主体,分别对应在场与远程在场,这两种主体逐渐衍生出今天的智能主体。

远程在场问题很容易在体育赛事的媒介再现中找到佐证。足球裁判由于媒体尤其是无处不在的电视转播镜头而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Webb, 2017, pp. 156 - 158)。媒介体育所呈现的赛事与裁判能够从类似视频助理裁判(VAR)这样反哺赛场赛事的媒介中获得的赛事认知是截然不同的,这种不同便是裁判压力的集中体现。媒介体育中的赛事是导播从数十台摄像机镜头记录的画面中精心选择的,是音频师从数十个拾音话筒中优选出的,还是体育解说员二度叙事加工后的产品,这种产品难免不带有技术的“情绪”甚至偏见,却被受众认为是“绝对客观”的,这是当代媒介体育赛事的深层神话之一(魏伟,2011)。裁判员做出重要决定所依据的图像是未经加工的、原始的、多角度的素材,与受众接受的影像截然不同。两者之间的差异所带来的争议是客观存在的(Benítez, 2020, pp. 39 - 69)。这也就是篮球和足球等重要赛事的需要被公开的裁判报告时常与受众(包括体育新闻工作者)的认知存在差异的原因。裁判员是球场上距离球员们最近的人,但在关键判罚时却不得不依赖百米之外的VAR,有时甚至是千里之外的视频回放中心,这种舍近求远的“远托邦”解决方案不啻为后现代媒介体育赛事的一个反讽。

此外,VAR技术的使用有着浓郁的时代色彩,是国际足联(FIFA)为了跟前任主席布拉特等官员的贪腐事件迅速撇清关系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其技术本身的可信度仍然值得怀疑。尽管FIFA声称2018俄罗斯世界杯VAR的准

确率高达 99.3%，但这一自说自话的数据其实难以掩盖西班牙学者希德和加西亚（Cid & García, 2020, pp. 70 - 85）提出的 VAR 系统过度重视视频材料而完全忽略音频证据的缺陷。不仅仅是 VAR，网球和板球比赛中的鹰眼技术、足球比赛中的门线技术等都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

同时，学者张一兵提出的“远托邦”还是赛博格时代身体论的一种反讽式的提喻。人们甚至已经在体育赛场上看到“人机”的出现，提前目睹赵毅衡提出的“人类世的黄昏”（2020a）。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一再强调“解蔽”是现代技术的本质，促逼是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海德格尔，2018b, pp. 5 - 40）。那么，当代体育赛事中的各种技术应该如何解蔽呢？这不得不从人机结合的赛博格开始说起。

三、媒介体育赛事中的赛博格化

2014 年巴西世界杯揭幕战上，28 岁的巴西截肢青年朱利亚诺·平托身穿“机械战甲”，为这场万众瞩目的揭幕战开球。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隐喻。身着有“外骨骼”之称的机械战甲的残疾人踢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具科技含量的一脚：大脑控制机器不只是梦想，而是已经开始照进现实。澳大利亚学者拉滕提出，技术创新对体育的影响无外乎通过文化和社会两种路径实现（Ratten, 2017, p. 7）。2019 年 10 月 12 日，肯尼亚长跑名将基普乔格（Eliud Kipchoge）以 1h59'40.2" 的成绩超过了马拉松原世界纪录，这是人类在马拉松历史上第一次突破两小时大关。但这一成绩并未被国际田联认可。加拿大学者罗森博格和美国学者塞勒斯从哲学的视角对此进行分析，原因有四：一是运动员“选择性”地运用了科技；二是这一过程对于“纪录”的概念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三是测试赛和正式比赛的区隔；四是马拉松的定义需要厘清（Rosenberg & Sailors, 2022）。其中，基普乔格在测试中穿的耐克阿尔法飞鞋是引起争议的核心，有学者认为马拉松选手穿上这种特制跑鞋参赛相当于游泳运动员穿上鲨鱼皮泳衣，所获得的成绩不再是运动员在自然状态下的成绩。也就是说，是赛博格而非人类创造了这一新世界纪录，因此这一成绩不被认可自然无可厚非。

今天，大数据、AI 技术和量子计算技术几乎已经统治了职业体育赛事，无论是运动员训练、比赛和休整还是媒介体育赛事转播，新技术的使用无处不在（Torgler, 2020, pp. 153 - 173）。赛博格也不例外。

“赛博格”一词出现于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学者克林斯和克兰在 1960

年的《赛博与空间》一文中率先提出了这个词。彭兰提出,智能设备推动下人的赛博格化不仅仅是对人的增强,在一定意义上还会推进某些时候人在虚拟与现实两重空间的同一化(2020, pp. 355 - 356)。当代体育赛事中的赛博格化愈演愈烈,人机结合在职业体育赛事中比比皆是。学者黄典林、马靓辉提出了移动数字媒体与人的身体互嵌,数字技术因而成为一种具身技术或者电子器官(2020)。戴着电子手表和电子通信设备的裁判成为加强版的赛博格——人机;戴着耳机,时刻与数据分析师和录像剪辑师通话的教练员成为人机;运动员通过不断升级的营养剂,能使快速恢复身体的“黑科技”,加强版的运动鞋、鲨鱼皮、假肢,领跑的“兔子”和不断优化的比赛环境来大幅度提升成绩;甚至连在现场转播赛事的摄像团队也开始“离身”工作——云端转播已经成为现实。竞技赛事呈现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景观。

媒介作为一种可穿戴设备,具备传感器与身体数据化、自我追踪与自我规训功能(宋美杰,徐生权,2020)。美国学者兰札和伯曼强调在人类“理解空间、时间和现实本身的本质,以及它们的生物中心基础之前,具备意识的机器不会也不可能出现”(2017, p. 170)。米歇尔也提出,人类倾向于高估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低估人类自身智能的复杂性;即便超级智能已经出现了,那么通用人工智能的复杂性充其量与人类是相当的(2021, pp. 311 - 312)。然而,技术哲学家胡翌霖认为,技术是人类能力的延伸和凝结,这里的能力既包括体能,也包括智能,技术就是凝聚为人工物的智能(2020, p. 185)。从这个角度来讲,技术显然是有智慧的。体育领域里的“人机”显然是有意识也有智慧的,而且这种意识和智慧的指向性是比较明确的。

今天,机器人、人工智能与体育的结合之紧密,令人瞠目结舌。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机器人在身体能力方面已经全方面超越人类,日本科学家北野弘树甚至声称,自己研制的机器人足球队将会在2050年前击败世界杯冠军球队(Kirchner, 2020, pp. 73 - 89)。这让人不禁担忧:被伪装成运动员的人机或机器人,会不会在未来甚至已经出现在国际赛场上了呢?机器人或者人机检测背后的伦理学和法律空白需要得到学术界的关注。

法国哲学家维利里奥提出,在网络信息技术下我们的生物感官被电子义肢替代了,电子图像、电子音响和电子感触器隔开了我们与世界的直接接触(Virilio, 1995, p. 56)。这种不通过我们的感官生成的无目光的视觉即机器视觉与大众传媒合流,主宰了人类。在电子技术主宰一切的时代,体育管理部门越发依赖电子技术来“秉公执法”,裁判的判罚似乎有没落的趋势。随着媒介赛事技术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赛场赛事,体育比赛中裁判判罚的“人

性”越来越弱，“工具理性”越来越强。已经开始有人提出，人本主义可以逐渐从体育赛事中退场，依据是这可能是体育赛事无限接近绝对公正的重要前提。那么，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以前运动员需要通过兴奋剂和性别检查才能参加比赛，今后是不是需要增加人机检查？裁判员今后是不是不必再出现在赛场上？零度赛场赛事和纯媒介赛事今后会不会去人类化、去人性化？1950年，图灵在撰写《计算机与智能》时提出，希望人类更加包容机器。但在人类将越来越多事务的主导权移交给机器之时，究竟谁是奴隶，谁是主人？谁是圈养者，谁又是被圈养者？（卡普兰，2016，pp. 189 - 197）

意大利学者布拉伊多蒂提出了去人性化的“后人类”的概念，指出后人类与非人类、非人性、非人道、反人类相关联并且互相重叠，也与经济全球化和技术中介化密切关联（Braidotti，2016）。学者刘溪对于赛博格对体育精神的重释也从后人类的视域展开（2021），但她仍然停留在其对身体观的影响以及体育正义和体育美学层面。美国学者海勒用符号矩阵图示勾勒出了后人类的虚拟图景（2016，p. 334）。这个格雷马斯矩阵的四极分别是在场、缺席、模式和随机，四者顺次否定前者的存在，并且通过破坏和复制的方式加以协调。这个符号方阵生动地描绘了后人类的虚拟性特征。在可以自由追逐生物技术带来的革命性浪潮之后，人类不会面临历史的终结，而是进入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谓的“后人类历史的开端”。

维利里奥还提出，数字技术本来是让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可事实却恰恰相反，通过数字技术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越发达，完整的世界观就会越少（Virilio，1988，pp. 121 - 122）。由于具身和离身的内涵和外延在悄然发生变化，人们对于竞技赛事的认知发生扭曲、错位。这是对传统体育竞技赛事的背离，同时也是对新技术的越发迷恋和依赖。加拿大技术哲学家芬伯格指出，“我们的技术越成功，违反古代智慧的诱惑就越强烈。技术使人幻想有上帝般的力量来征服自然并使其服从我们的意志”（Feenberg，2017，p. 1）。不难想象，人机结合今后的确有机会主宰职业赛事甚至是奇观赛事，这可能是现代体育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必然结果。根据周生旺、程传银的研究，人工智能融入体育至少将带来四个方面的伦理困境：僭越了体育的身体主体地位，其机器属性难以实现体育的身体价值，其技术存在潜在的身体伦理风险，技术范畴超越了体育的身体界限（2021）。这一结果的出现可能与这些体育项目被发明时的初衷相去甚远，但它几乎又是不可避免的。

体育中的人机关系值得体育人文社会学者高度关注，因为当代社会中的人机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技术、身体与体育三者之间，技术对自然

人身体的入侵正成为相关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 (Magdalinski, 2009, pp. 1 - 13)。计算机在自身技术演化的过程中与人类社会完全地融合, 计算机不仅延展了人类的物理身体, 也延伸了人类的知觉、智能、情感与伦理 (成素梅, 张帆, 2020, p. 91)。在不经意间, “奇点” 已经降临并且发生翻转。今天, 体育赛事中的很多新规则的制定似乎都是为机器或人机取代人服务的, 算法和大数据不仅掌控了运动员的日常训练, 并且在比赛中也控制了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其他工作人员, 甚至还掌控了采访报道比赛的媒体人, 进而掌控了受众, 让所有与体育相关联的人都成为机器的臣服者。美国学者普利亚诺一再强调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人要培养出 “人情味”, 与他人建立情感纽带 (Pugliano, 2018, pp. 79 - 82); 徐英瑾提出人工智能理当服膺柏拉图式德性论、幸福式德性论、行为者德性论和击靶德性论这四种当代德性论 (2021, pp. 274 - 282)。尽管如此, 技术给民主套上一层外衣, 未必能够让竞技体育运动变得更好, 但一定将在去人类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符号学家赵毅衡认为, 智能分成了理性客观和感性主观两个部分; 人工智能的意义方式是基于算法的客观活动, 能处理理性部分, 对感性部分却无能为力 (2020b)。媒介体育赛事的赛博格化也许可以部分解决可见的准确性问题, 却会在人性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四、媒介体育赛事技术的意识形态与立场

媒介体育赛事的技术日新月异, 其变化速度始终引领竞技赛事规则的变化。有些体育赛事的规则随着体育媒介化发展的进程在发生变化。媒介体育赛事的技术被普遍认为是透明的、中立的和不带意识形态偏见的, 甚至成为当代竞技赛事民主化的重要标志。但事实如何呢?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的《作为 “意识形态” 的技术与科学》为纪念马尔库塞 70 周年诞辰而作, 这篇文章提出的观点相当重要。它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 大胆地推论技术与科学的意识形态影响, 甚至是唯意识形态影响。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从当代媒介体育赛事技术的发展可见一斑。美国学者布林森提出, 技术的价值观已经融入我们设计和建造的一切技术中 (Brinson, 2020)。也就是说, 媒介体育赛事技术从被设计和发明时, 就已经带有某种属性和倾向, 它很难被认为是绝对中立和客观的。无论是鹰眼技术, 还是足球的门线技术和 VAR 技术, 都不可避免地携带设计者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尽管设计者不断强调技术是用来避免体育赛事中的不公正现象的。自

从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和欧足联前主席普拉蒂尼丑闻事件之后，足球赛事密集地推出了一系列科技创新举措，除了门线技术和VAR技术之外，电子性能跟踪系统（EPTS）和半自动化多摄影机系统（SAMCS）、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内部负载监控的可穿戴设备（WIWM）等新技术纷纷起用，这些技术更主要的目的是其意识形态内涵，即遮蔽政治和外交层面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除了意识形态之外，技术本身的准确性也是令人生疑的。位于新泽西州的NBA视频回放中心运用架设在各个赛场内的几十台摄像机提供的视频来判断关键时刻的判罚。但不同视角的视频提供的经常是自相矛盾的阐释，这是因为无论是单个的摄像机镜头，还是作为一个整体的镜头群，都只是符号再现的一部分。尽管绝似符号在知觉上可以提供客观性，但事实上的客观并不易得。寄希望于技术为体育带来“公正”和“公平”（Simón, 2020, pp. 3 - 22），是颇为理想主义的想法，在理论上是违背符号学的片面性原则的。

有意思的是，加拿大学者马伦（Mallen, 2019, pp. 159 - 170）在预测未来新兴技术对体育的影响时，提出了十大猜想：一是体育竞赛子类别的数量将持续增加；二是运动员将自行申报提升运动成绩的技术，也就是运动员生物学护照；三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将通过现场分子通信测试扩大兴奋剂随机测试范畴；四是所有体育器材在比赛前都要经过原材料和内部元素的高级检查；五是包括仿生视觉技术在内的视觉技术将被运动员合法用于体育比赛；六和七是性别和兴奋剂检测将持续成为争议性事件，尽管在检测过程中运用了大量新兴技术，但在体育赛事中仍然无法消除相关违规现象；八是人工智能（机器智能）将在帮助人类体育仲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九是只有在气候变化的影响变得极端之后，气候变化逆转技术专家才能在整个体育系统中变得不受欢迎；十是由于不断进步的新兴技术，体育将持续面临变革的压力。这十大猜想有些正在或者已经成为现实，有些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有些可能比当初的猜想来得更加迅猛。但在今天，单纯的新兴技术给体育带来的变革可能未必比意识形态和立场所带来的更多、更深刻。

引用文献：

- 布拉伊多蒂，罗西（2016）. 后人类.（宋根成，译）.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 成素梅，张帆（2020）. 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弗洛里迪，卢西亚诺（2015）. 第四次革命：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人类现实（王文革，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符号与传媒 (25)

- 哈维, 大卫 (2004). 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 (阎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海德格尔 (2014). 哲学论稿 (从本有而来)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海德格尔 (2016). 时间概念史导论 (欧东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海德格尔 (2018a). 存在与时间 (陈嘉映, 王庆节,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海德格尔 (2018b). 演讲与论文集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海勒, 凯瑟琳 (2016).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刘宇清,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胡翌霖 (2020). 什么是技术.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 黄典林, 马靓辉 (2020). 身体问题的传播研究路径刍议. 新闻与写作, 11, 12-19.
- 卡普兰, 杰瑞 (2016). 人工智能时代: 人机共生下财富、工作与思维的大未来 (李盼,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 兰札, 罗伯特 & 伯曼, 鲍勃 (2017). 超越生物中心主义: 以生命和意识为中心重构时间、空间、宇宙与万物 (杨泓, 孙红贵, 孙浩, 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 刘海龙 (2018). 传播中的身体问题与传播研究的未来. 国际新闻界, 2, 38.
- 刘海龙, 束开荣 (2019). 具身性与传播研究的身体观念——知觉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的视角. 兰州大学学报, 2, 81-82.
- 刘溪 (2021). 赛博格对体育精神的重释——基于后人类视域的考察.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4, 39-43.
- 米歇尔, 梅拉妮 (2021). AI 3.0 (王飞跃, 等译).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 莫兰, D. (2019). 具身性与能动性 (罗志达, 译). 深圳社会科学, 5, 45.
- 尼采 (2020).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彭兰 (2020). 新媒体用户研究: 节点化、媒介化、赛博格化的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普利亚诺, 约翰 (2018). 机器人来了: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生存法则 (胡泳, 杨莉萍, 译). 北京: 文化发展出版社.
- 宋美杰, 徐生权 (2020). 作为媒介的可穿戴设备: 身体的数据化与规训. 现代传播, 4, 46-47.
- 孙玮 (2018). 交流者的身体: 传播与在场——意识主体、身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 国际新闻界, 12, 83-103.
- 孙周兴 (2020). 人类世的哲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魏伟 (2011). 解读神话: 南非世界杯电视转播的符号学研究. 中国体育科技, 2, 47-51.
- 魏伟 (2015). 重访电视与体育的“天作之合”: 从布尔迪厄说起.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 33-39.
- 魏伟 (2019). 解构当代媒介体育赛事的权力迷思: 基于约翰·费斯克的视角.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1, 72-79.

- 魏伟 (2020). 波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奥运会. 符号与传媒, 秋季, 109 - 127.
- 魏伟, 马博文, 张帅 (2022). 国际体育传播研究的趋势与展望——基于 SSCI 和 A&HCI 期刊的计量分析 (2016—2020 年).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3, 15 - 22.
- 魏伟, 尚希萌 (2021). 体育媒介化: 从媒介体育到体育重大事件.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7, 44 - 57.
- 徐英瑾 (2021). 人工智能哲学十五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赵毅衡 (2020a). AI 与“人类世”的黄昏: 一个符号学预测. 2020 符号学年会, 10 - 22.
- 赵毅衡 (2020b). 人工智能艺术的符号学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5, 107 - 115.
- 周生旺, 程传银 (2021). 身体与技术: 身体哲学视域下人工智能融入体育的伦理哲思.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9, 6 - 8.
- Barnfield, A. (2013). Soccer, Broadcasting, and Narrative: On Televising a Live Soccer Match. *Communication & Sport*, 4, 326 - 341.
- Benítez, A. (2020). “Is It the Same for the TV Screen as for the VAR? Planning the Use of Cameras and Replays to Solve the Controversy”. In M. Armenteros, A. Benítez, & M. Betancor (Eds.), *The Use of Video Technologies in Refereeing Football and Other Sports*. New York: Routledge.
- Brinson, S. (2020). *Is Technology Neutral?*. Retrieved from <https://medium.com/understanding-us/is-technology-neutral-39d5b445b315>. 11-17.
- Buscombe, E. (1975). Cultural and Televisual Codes in Two Title Sequences. In E. Buscombe (Ed.), *Football on Television*. London: BFI.
- Cid, M., & García, A. (2020).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udio and the Video Assistant Referee in Football. In M. Armenteros, A. Benítez, & M. Betancor (Eds.), *The Use of Video Technologies in Refereeing Football and Other Sports*. New York: Routledge.
- Feenberg, A. (2017). *Technosystem: The Social Life of Reas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eidegger, M. (2004). *Der begriff der zeit*. Frankfurt: Vittorio Klostermann.
- Kirchner, F. (2020). Robotics and AI: How Technology May Change the Way We Shape Our Bodies and What This Does to the Mind. In S. Schmidt (Ed.), *21st Century Sports: How Technologies Will Change Sports in the Digital Age*. Cham: Springer.
- Magdalinski, T. (2009). *Sport, Technology and the Body: The Nature of Performance*. London: Routledge.
- Mallen, C. (2019). How Emerging Technologies Reframe Sport. In C. Mallen (Ed.),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 Sport: Implications for Sport Management*. London: Routledge.
- Marriott, S. (2007). *Live Television: Time, Space, and the Broadcast Event*. London: Sage.
- Merleau-Pondy, M. (2002).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C. Smith, Trans.). London: Routledge.

- Morse, M. (1983). Sport on Television: Replay and display. In A. Kaplan (Ed.), *Regarding Television: Critical Approaches—An Antholog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
- Ratten, V. (2019). *Sports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ssessing Cultural & Social Factors*.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 Rosenberg, D., & Sailors, P. (2022). What Money can Buy: Technology and Breaking the Two-hour “Marathon” Record.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1, 1–18.
- Sartre, J. (1978). *Being and Nothingness: A Phenomenological Essay on Ontology* (B. Hazel, Trans.). London: Methuen.
- Schilling, C. (2003). *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 2nd edition. London: Sage.
- Torgler, B. (2020).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Quantum Computing in Sports. In S. Schmidt (Ed.), *21st Century Sports: How Technologies Will Change Sports in the Digital Age*. Cham: Springer.
- Simón, J. (2020). Between Scepticism and the Long-awaited Quest for “Football Justice”. In M. Armenteros, A. Benítez, & M. Betancor (Eds.), *The Use of Video Technologies in Refereeing Football and Other Sports*. New York: Routledge.
- Turner, B. (1992). *Regulating Bodies: Essays in Medical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 Virilio, P. (1988). *La Machine de vision: essai sur les nouvelles techniques de representation*. Paris: Galilée.
- Virilio, P. (1995). *La Vitesse de liberation*. Paris: Galilée.
- Webb, T. (2017). *Elite Soccer Referees: Officiating in the Premiere League, La Liga and Serie A*. Abingdon: Routledge.
- Wei, W., & Siying, L. (2022). De-globalization, De-commercialization, and Semi-Mediatization: The Influence of COVID-19 on Global Sport communication. In P. Pederson (Ed.), *Research Handbook on Sport and COVID-19*.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作者简介:

魏伟, 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国际体育传播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体育文化传播、符号学等。

Author:

Wei Wei, Ph. D., professor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director of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port Communication and Diplomacy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sports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emiotics, and etc.

Email: wwei@bfsu.edu.cn